

# 史学研究网

—— 史学理论、史学史、海外中国学史研究

| 首页 | 学术信息 | **史学理论研究** | 史学史研究 |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| 海外看中国 | 书窗、书评 | 报道、随笔 | 专

▶ 您现在的位置： 史学研究网 >> 史学理论研究 >> 视野领域 >> [专题]谢保成 >> 正文

今天是： 2009

⇒ 谢保成：20世纪前期两次关于“国学”与“国粹”、“国故”的论辩

热

## 谢保成：20世纪前期两次关于“国学”与“国粹”、“国故”的论辩

[ 作者：谢保成    转贴自：《探索与争鸣》2008年第11期，中国经济史论坛转载    点击数：255    文章录入：

80多年前，群学社将当时关于“国学”与“国故”的论辩编辑为《国故学讨论集》出版。马寅初《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》形象地概括了讨论中出现的种种不同之“国学”：“‘国学’之为物一，实则三，北京国学研究所之国学，赛先生之‘国学’也；无锡之国学专修馆，冬烘先生之‘国学’也；上海之国学专修馆，神怪先生之‘国学’也。”时下谈“国学”的文章不少，不能说没有“冬烘先生之‘国学’”，也不敢说没有“神怪先生之‘国学’”，但仅就所见，大都“冬烘先生之‘国学’”，因其一“学”、“国粹”二词是舶来品；二不知20世纪初、20世纪20年代有过两次关于“国学”与“国粹”的论辩；三是互相传抄这样几句话——“国故”包含中国固有历史与文化之全部，其中之精粹”，以“国故”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称“国故学”，简称“国学”，“国故”与“国学”有相同之处——是率意捏合两次论辩中的不同观点，甚至不知“国粹”一词辛亥(1911)年后逐渐弃而不用。不知”，难怪一些日本学者哂笑中国时下说“国学”者的“国学”知识浅薄，最让人家嗤笑的是“冬烘先生之‘国学’”者竟然不知“冬烘”。为此，将20世纪前30年两次论辩情况作一清理，以供热衷“国学”、“国粹”、“国故”者参阅。

### 20世纪初：“国学”与“国粹”的论辩

“国学”一词，在西学和“欧化主义”刺激下，由日本学界最先提出来。戊戌变法前夕，《时务报》所载严复《辟韩》一文，提到《东华杂志·汉学再兴论》中日本学界有“国学勃兴西学”的说法。

“国粹”的舶来，几与“国学”同时。1901年9月，梁启超的《中国史叙论》有“中国民族性质，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，终属空言耳”句，为国人最初在报刊上使用“国粹”一词。1902年梁启超致函康有为，说“日本当明治初元，亦以破坏为事，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。国粹固大善，然使二十年前昌之，则民智终不可开而已”。7月，《译书汇编》第5期刊载佚名《西学之消长》，传递日本两种“主义”的对垒：“国粹主义者谓保存己国固有之精粹与他国强同，如就国家而论，必言天皇万世一系；就社会而论，必言和服倭屋不可废，男权等类。一为欧化主义，欧化云者，谓文明创自欧洲，欲己国进于文明，必先去其国界，以欧洲为师。极端之论，至谓人种之强，必与欧洲互相通种，至于制度文物等类无论矣。”同月梁启超与黄遵宪商议在日本创办《国学报》，“当以保国粹为主义，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”建议“当以此作一《国学史》”。其论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，将“国学”与外学论：“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，则当转输之任者，必邃于国学，然后能收其效

1903年初，章太炎致函刘师培，深信“他日保存国粹，较诸东方神道，必当差胜也”。《浙江潮》刊载“社说”《国魂篇》，以“国粹主义”与“世界主义”同为“一国进化之两大主义”因“苏报案”入狱，作《癸卯口中漫笔》，自谓“上天以国粹付余”。

1904年3月，黄节在《政艺通报》第1号发表《国粹学社发起辞》，声明“国粹，日本也。吾国言之，其名词已非国粹也”，表示“于保存国粹之一面，务欲发挥而光大之，以生色”。12月，黄节在《政艺通报》第11号发表《国粹保存主义》，介绍日本国粹主义者，国家特别之精神也。昔者日本维新，欧化主义浩浩滔天，乃于万流澎湃之中，忽焉而动力焉，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。当是时入日本国民思想而主之者，纯乎泰西思想也，如同焉，主行者以泰西学理主行之，反对者亦以泰西学理反对之，未有酌本邦之国体民情为根者也。文部大臣井上馨特谓此义，大呼国民，三宅雄次郎、志贺重昂等和之。其说以为宜长，补我之短；不宜醉心外国之文物，并其所短而亦取之，并我所长而亦弃之。”同时解“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，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。”

光绪二十九年，清廷颁布《学务政纲》，以“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，此即保存国粹之随后，大臣奏议多有“国粹”的说法，如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、赵尔巽、张之洞等会衔奏请校，认为学堂“首以经学根柢为重”，“益于保存国粹，尤为竞竞”。

20世纪初，谈“国粹”成为时髦：“近数年来，中国之号称识者，动则称国粹。环海内外报章书籍，或曰保存国粹，或曰发挥国粹，甚者则曰国粹之不讲则中国其真不可救药。”

“国粹”或“国学”二词最初出现，基本是转述日本的说法。1905年1—2月间，国学保存“研究国学，保存国粹”确定为宗旨，将“国学”与“国粹”捏合在一起，并创办了《国粹学报》。黄节、邓实、章太炎、刘师培等所谓“国粹派”，对于“国粹”或“国学”始终存在着不尽解和说法。

黄节以“名从主人，物从中国，吾有取于其义云尔”，表示与日本所说“国粹”不同。其取于其义者，在“粹”而不在“国”，认为“发现于国体，输入于国界，蕴藏于国民之原质，为之思想者，国粹也；有优美而无粗犷，有壮旺而无稚弱，有开通而无锢蔽，为人群进化之国粹也”，只要适当今中国之用，均为“国粹”。章太炎发表《印度人之论国粹》，就像是有的“吾有取于其义云尔”，认为“义有是非，取是舍非者，主观之分；事有细大，举大而不观之分”，明确表示：“国粹诚未必皆是”。1906年出狱到日本，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讲，“用国粹激动种姓，增进爱国的热肠”，提出“为甚提倡国粹？不是要人尊信孔教，只是们汉种的历史。这个历史，是就广义说的，其中可以分为三项：一是语言文字，二是典章是人物事迹。”这一说法，与黄节的“国粹”说显然不同。邓实为《国粹学报》所写《发刊辞》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，以为一国之粹，精神不灭，则国亦不灭”。但邓实更强调在1904年发表《国学保存论》针对“异国异学”，将“国学”视为本国之学。1906年《国学讲步为“国学”定义：“国学者何？一国所有之学也。有地而人生其上，因以成国焉，有其国者者也，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，而自治其一国也。国学者，与有国而俱来，因乎地理，根而不可须臾离也。君子生是国，则通是学，知爱其国，无不知爱其学也。”章太炎在《民报》表《国学讲习会序》，讲的还是“就广义说的”历史的三项内容，使用的却是“国学”一词，“吾闻处竞争之世，徒恃国学固不足立国矣，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。吾闻有亡者矣，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乃能立者矣。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，即将影响于国家之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！”1907年邓实在《国粹学报》第2号发表《国学真论》，引入西方观念，说“近人于政治之界说，既知国家与朝廷之分矣，而言学术则不知有国学、君学之辨，学于君学之内，以事君即为爱国，以功名利禄之学，即为国学，其乌知乎国学自有其真哉的区分：“以人君之是非为是非者”为“君学”，“不以人君之是非为是非者”为“国学”。所谓“是非为是非者”，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是通过字里行间表述出来、却实现不了的“空想”或“学反映在诸子学说或部分文集当中。

在此前后，《国粹学报》内容逐渐发生变化。1906年第11、12号发表章太炎《某君与报书》、《与某书》，论“学”而不说“粹”，强调“鄙意提倡国学，在朴说而不在华辞”，开“故”的说法：“国故日衰，得《朴学报》振起之”。1910年第1号发表章太炎《与王鹤鸣书》用无用作为衡量“学”的标准：“仆谓学者将以实事求是，有用与否，故不暇计求”，“学在辨

情伪，虽致用不足尚，虽无用不足卑”。1911年第9~13号（《国粹学报》最后一期）发表章竹居，主张将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同看待，“令后生得以讨类忘国故”，指责“通经致用之说，则汉儒所以求利禄者，以之哗世取宠，非也”。接受上1908年刘师培在《国粹学报》创办三周年之际所写祝词提出“不以学术为适时之具，斯能自认为‘学古为人官之阶梯，变通乃趋时之捷径’是造成‘道衰学敝’的原因。《国粹学报》19总结办刊大旨，发布《明年之特色》，提出“力避浮华而趋于朴学”。“训释周秦诸子之书，读，引申乾嘉诸儒之学，不绝其绪，说明小学，以为求学之门径，谨守古谊，以毋越先民

“国学”与“国粹”两个舶来词并行，反映近代社会变革当中，学术与政治的某种复杂关系。《国粹学社发起辞》中已经点明：“日本之言国粹也，与争政论；吾国之言国粹也，与争日本谈“国粹”完全出于政治需要；中国谈“国粹”既是学术，又需要借助外来观念做政为“激动种姓”，以学术作为革命舆论工具，往往使用“国粹”的说法。但学者的习性注可能让学术沦为政治的奴婢，在从事学术研究时，往往使用“国学”的说法。章太炎刚出留学生欢迎会演说时“用国粹激动种姓”，而在随后的《国学讲习会序》中则用“国学”是一明显例证。刘师培自称“为《国粹学报》撰稿，率意为文”，而“民元以还”关于三“堪称信心之作”，可谓又一例证。只有把握住近代社会变革中学术与政治的这一层关系“国学”与“国粹”才不至于因名词概念而被弄得含混不清。辛亥革命完成“反清”历史“国粹”这一带有政治色彩的词语便随之被弃用，《国粹学报》即便“力避浮华而趋于朴难免停刊的命运。

## 20世纪20年代：“国故”与“国学”的论辩

1919年1月，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、罗家伦等创办《新潮》杂志，以“唤起国人对于本党心”。国学保存会成员、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、黄侃与学生张煊、罗常培等，沿章太炎“国故”一词成立国故社，“慨然于国学沦夷，欲发起学报，以图挽救”，3月创办《国故》（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），所刊文章全为文言，不用新式标点。5月，毛子水针对《国故》《新潮》1卷5号发表《国故和科学的精神》，傅斯年在文章结尾处写了一段“附识”，指出有两种手段，一，整理国故；二，追摹国故。”“整理国故”一词第一次被提出，指“把我中术、政治、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”。随即，张煊在《国故》第3期发表《国故和科学的精神》。8月中旬，胡适写信给毛子水，提出“应该尽力指导‘国故家’用科学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，不当先存一个‘有用无用’的成见”，“当存一个‘为真理而求真度’”。12月，胡适在《新青年》7卷1号发表《新思潮的意义》，提出“研究问题，输入学理，再造文明”，说“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，什么是国渣，先需要用评判的态度，科学的精番整理国故的功夫”并将“整理国故”分为四步：“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”，“第二步是要学术思想怎样发生，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”，“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，作精确的考证意义弄得明白清楚”，“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，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，各家求真价值”。在随后的两年间，胡适先后在各校演讲，都是讲“研究国故的方法”，认为“国故”的名词，比“国粹”好得多。……如果讲“国粹”，就有人讲“国渣”。“国故”（Natic这个名词是中立的。”将四个步骤提升为四种方法：历史的观念、疑古的态度、系统的研究内容的整理。

1923年1月，胡适“代表全体”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学术刊物《国学季刊》作“发刊词”，对“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”，“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”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”等观念，提出“研究国学的方针”：“国学的使命是使中国过去的文化史；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；国学的目的成为中国文化史。国学的系统的研究，要以此为归宿。一切国学的研究，无论时代古今，无小，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。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；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力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。”同年同月，梁启超在南京东南大学作《治国大路》的演讲，认为“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”：一是文献的学问，“应该用客观的去研究”；二是德行的学问，“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”。在讲第一条路时，

出：“便是近人所讲的‘整理国故’这部分事业。”提出研究国学的三条标准：一是剔去事，修正前人的误解；二是“将同类或有关系的事情网罗起来贯串比较”；三是注意别部门学问的关系，注意本部门学问中各方面的相互关系，成为“通学”。

1924年2月，吴文祺的《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》指出，“一二年来，整理国故的呼声嚣尘上了”，认为“近人往往把国故学省称为国学，于是便引起了许多可笑的误会”，呼吁“定义”，为国故学“下一个定义”：“用分析综合比较种种方法，去整理中国的国故的学问，叫学。”其认识的突出之点在“国故学是一种科学”，“真正懂得科学的人，都承认国故学一种”。曹聚仁的《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》归纳当时存在的三种不同的“国故观”以及三态度，明确“国故者，五千年间中华民族以文字表达之结晶思想也”，“国故学者以‘国究之对象，而以科学方法处理之，使成为一种科学也’”。

由于“整理国故”被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，《小说月报》专门辟出一个专栏“国故与新文学运动”，鲁迅、郭沫若、成仿吾等或在《小说月报》，或在其他刊物发表各自

1924年1月，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校友会作《未有天才之前》的演讲，说“自从新国以后，其实何尝有力，而一群老头子，还有少年，却以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”，认为“旗子来号召，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。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，那更是荒谬绝伦！”郭沫若在《创造周刊》36号发表《整理国故评价》，指出“整理国故的流风，近来也几乎成时代的共同色彩了”，“这种现象，决不是可庆的消息”。不赞成“四处向人宣传整理国故研也反对“本着良心的命令要研究科学或者要造机关枪”的倾向。针对胡适“发明一个字的出现一颗恒星，都是一大功绩”的说法，强调“研究的方法要合乎科学的精神，研究有了心能说到整理。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尤不可估之过高”。

此后，胡适等开始反思“整理国故”中出现的问题。1926年6月胡适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会上对整理国故中出现偏差表示了“我大约总得负一点点责任，所以不得不忏悔”的态度，究国学，你也研究国学，国学变成了出风头的捷径”，“有许多人，方法上没有训练，思想的参考材料，头脑里没有弄清楚，就钻进故纸堆里去，实在走进了死路！”1928年在《新月表《治学的方法与材料》，说“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，这是最可悲叹的。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，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：那是条活路，这条故纸的路是死们在科学实验室里有了好成绩，然后拿出你们的余力，回来整理我们的国故”。

最先提出“整理国故”的傅斯年，1928年10月在《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》中明确“‘国故’一个观念”，认为“国故本来即是国粹，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，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有的存古学堂”。

### 回首当年对于“国学”的认识

1922年，北京大学首创文科现代学术研究机构——研究所国学门，出版《国学季刊》《门周刊》（后改为月刊）。一时之间，南北新型大学相继成立国学研究机构，如东南大学（1921年）、清华国学研究院（1925年）、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（1926年）、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（1927年）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（1930年）等，并创办国学研究刊物。

据当时编印的《国学论文索引》，民国年间刊载国学论文的杂志83种，冠名“国学”或“国学研究”的19种。1919年之前成立的国学社会团体8家、创办的国学刊物6种。1920年以后成立的国学社会家，创办的国学刊物12种。

多数论者倾向于使用“国学”一词，唯有陈独秀、何炳松明确表示反对。1924年陈独秀发表《国学》短文，赞成“看作历史的材料来研究”的“国故”或“中国学”，但认为“学问无国不但不成个名词，而且有两个流弊：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，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”。1925年何炳松在《小说月报》20卷1号发表《论所谓“国学”》，认为“由国学两个字生出的流弊无穷，将来一定要使得我国的文化在混乱无望固步自封的境界里面”，提出一个口号：“中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”。

使用“国学”一词者，认识和理解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差异，篇前已引曹聚仁的论述。他指“国学”一词的滥用给国学研究造成的危害：“今则国学如麻，略识‘之无’，能连缀成篇，谓为精

学’，啾唔诗赋，以推敲词句自豪者，谓为保存‘国粹’，他则大学设科研究中国文学，其系；开馆教授四书五经，乃以国学名其院，人莫解国学之实质，而皆以国学名其高，势国学将为国故学之致命伤。”一方面是“国学”概念的滥用，一方面是各大学的国学研究西方人文学科的分科理念，分设哲学、文学、历史学、考古学等研究室。这样的分科理念“国学”一科埋下伏笔。从东洋舶来的“国粹”、“国学”等概念，经过30年的滥用之后人文学科分科的规范中渐渐淡出历史舞台。

## 两次论辩的差异与启示

两次论辩对于学术文化的影响表现出明显差异，有不少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。

第一，背景、口号的差异。20世纪初的论辩，是在旧有体制之下进行的。国学保存会“研究国学，保存国粹”，强调“国粹”、“一国之精神”，主要为煽起民众的“排满革命”。随着其成员政治立场或政治态度的变化，转而为“学”，“提倡国学，在朴说而不在华辞”“致用不足尚，无用不足卑”，指责“通经致用之说，则汉儒所以求利禄者，以之哗世取也”。从“率意为文”转变为狭小圈子内的“信心之作”，难以产生影响，无法形成推进的作用。

20世纪20年代的论辩，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开展起来的。其口号之一是“整理国故，再造文明”，主要是为了“再造文明”或“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”。将国学研究的使命定为“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”，包括民族史、语言文字史、经济史、政治史、国际交通史、宗教史、文艺史、风俗史、制度史等十大方面，大大超出“保存国粹”的范围，其成影响着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学术走向。“整理国故”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，已融入到之中，因而产生出久远的影响。

第二，观念、方法的差异。随着说“国粹”、讲“国学”者历史观念的变化，不再关注社会，把难以实现的思想学说作为研究重点。1906年章太炎“负继东海”后开始重新认识社会历史。《俱分进化论》、《四惑论》，认为“进化之实不可非，而进化之用无所取”，称“进化认识迷妄所成，而非实有此进”。一改先前“熔冶哲理”的观念，认为史学无需名理统括：“不始于期验，转求其原，视听所不能至，以名理刻之。独治史志者为异，如卒不逾期验之理却焉。”讲“国学”主要讲“学说”，包括经学、诸子学及佛学，不包括历史。其《国略说》只收《论语言文字之学》、《论文学》、《论诸子学》，《国故论衡》只包括小学诸子学。刘师培《国学发微》没有界定“国学”，但重点分析经学流变，分门研究诸子。学术，注意“东汉末年，诸子之术朋兴。治儒家者有徐干，治阴阳家者有管辂，治医家者有法家者有魏武、诸葛亮、王昶，然以法家学术为最昌”，与邓实所说“孔子之学固国学，学亦国学”基本一致。在方法上，章太炎《致国粹学报社书》说得非常清楚：“弟近所与者，以音韵训诂为基，以周、秦诸子为极，外亦兼讲释典。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，故音韵管籥也；以真理为归宿，故周、秦诸子，其堂奥也。”《国粹学报》逐渐放弃社会学原理思想，基本倾向和方法大体因袭“以音韵训诂为管籥”、“以周秦诸子为堂奥”的方法，社会历史，难以产生多大影响。

新文化运动前后，章太炎的思想观念基本回到“仍以儒术为佳”的原地。论经史关系，价值标准：“但究史学而不明经学，不能知其情理之所在，但究经学而不明史学，亦太流不能明其源流也。”认为“疑五史之实录”、“贱可征之文献”、“横欲寻求鸟迹”、“史传”，都是“空穴来风”，“只自罔耳”。对于“科学”也表异议，1933年10月在《适之理学》一文中直言：“科学者流，乃谓道德礼俗，皆须合于科学，此其流弊，使人玩物丧志（纵）欲而败度。”不满新型学校的历史教学，认为“若诚欲昌明史学，非学校改制不可。”

与章太炎思想观念回归相反，“国故”、“国学”论辩从一开始就与“科学的精神”紧紧起。引发论辩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即为《国故和科学的精神》，明确提出：“‘科学的精神’，包括许多意义，大旨就是从前人所说的‘求是’”。吴文祺《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》科学国故学加以对比，点明二者的相通之处：“科学只是求真，并不含什么浅狭的功利而国故学的目的，也是求真。科学用分析综合比较的方法，以求事物的秩序关系，国故

此。科学家有‘无信不征’的口号，国故学家也最重客观的证据。”虽然论辩中各家对于或“国学”的认识与理解很不一致，但几乎没有不把“国故”或“国学”与“科学的精神”一起的。

正是基于“科学的精神”，“整理国故”或研究国学从观念到方法被逐渐系统化。“整理国故”在注入“科学的精神”之后，其范围逐渐出现史学化的趋势。胡适“代表全体”所写的《刊宣言》归纳国学研究三大方向的第一条就是“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”，并是多方面的，“过去种种，上自思想学术之大，下至一个字、一支山歌之细，都是历史，研究的范围”。梁启超在东南大学作《治国学的两条大路》的演讲，说第一条路“便是近人理国故”这部分事业。这部分事业最浩博最繁杂而且最有趣的，便是历史。”吴文祺《重释学之价值》也作如是说：“研究国故，一方面他自身本来具备历史所有的优点，一方面又种历史的重要工作”。顾颉刚为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》作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》出：“研究国学，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，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料。”

“科学”的观念，使“整理国故”或国学研究范围史学化；“科学”的方法，赋予“整理国故”研究史学方法。由此，“整理国故”或国学研究朝着史学化方向推进。以“科学”观念生出的疑发“古史”论辩，推动对中国上古社会的重新认识；以“科学”观念生出的缜密精神，形成“证”的科学方法，为中国古代研究“另辟一新纪元”。

第三，留下的启示。1. 两次论辩，正当社会变革、新旧交替之际。提倡“国粹”、“国故”保存，还是为创新，成为一个重要标志。凡遇到“国粹”或“国学”被滥用时，不妨先弄清楚之“国学”，“冬烘先生之‘国学’”，抑或“神怪先生之‘国学’”，不要“莫解国学之实质，而皆言高”，弄出一些懵懂浅陋、神怪迷信出来，使得研究不是研究，学术不是学术。

2. 考订学、文字学、校勘学、训诂学等，是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，从事国学研究、乃至历史研究，都离不开这些最基本的方法。但如果缺乏历史的眼光、疑古的态度、系统的“科学的精神”，难以取得更大的成绩。

3. “科学的精神”与20世纪学术文化的关系，以“国学”与“国故”论辩为契机，经疑古辨新证，以及随后兴起的文化史热，成为20世纪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，需要进行认真缜密的总结。

总之，谈“国故”要有“述往事，思来者”的历史观念，不只是从“国故”中寻找所谓的“国故”，而是要创造民族新文化；讲“国学”需要科学精神，不只是担心“国故”的沦丧，必须具有一切先进思想、科学文化的博大胸怀。不愿接受人类先进思想、科学文化，不以创造民族推动社会进步为指归，谈“国故”、讲“国学”，已有上述说“国粹”、讲“国学”者的鉴。

【作者单位：中国社  
（摘自《探索与争鸣》）】

- 上一篇文章： 福柯：作者是什么？
- 下一篇文章： 荣新江等：隋唐长安研究的新视野

【发表评论】 【告诉好友】 【打印】

#### 最新5篇热门文章

- 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京召开[161]
- 中共为何能在1949获胜：当年美远…[91]
- 访问记：余英时谈好友唐德刚[99]
- 黄现璠先生简历和著述编年目录…[426]


#### 最新5篇推荐文章

- 《史学研究网》寄语[5559]

#### 相关文章

没有相关文章

- [唐德刚先生逝世\[232\]](#)

 **网友评论：**（只显示最新10条。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，与本站立场无关！）

没有任何评论

| [设为首页](#) | [加入收藏](#) | [联系站长](#) | [友情链接](#) | [管理登录](#) |

2004-2007版权所有：史学研究网